

◀（上接 5 版）

开始。写得如何已无足轻重,关键是谁在写。宋代世俗流行以王著或院体书法作为绳墨尺度来衡量,用这样的标准评品东坡书迹,后者显然有点离经,黄庭坚所持当然是文章人品优先,并及笔墨,为他人所不及。不过,我们由此获知世俗社会所秉持的书法准则。

虽然集王书常常被作为王字庸俗化的产物遭受抨击,但集王成碑的传统仍然被延续。著名的有《绛州夫子庙碑》,我们已不太了解其集字来源,以理揆度,其源于前述若干唐人集王碑石的可能性很大。《普济禅院碑》《集右军牡丹诗》亦为宋人所集。

以《集王圣教序碑》为代表的王字传统的构建

随着南宋的灭亡,代表宫廷皇室书法的御书院传统随即中断。蒙古人的进入也使文人进阶的科举制度废除,汉文化追随者觉得前途渺茫,因为元朝最初的几位皇帝是否懂得汉文是值得怀疑的。读书习字与进仕关系不大,遂造成“学士老弃林丘,遗书束之高阁”的局面。14 世纪初科举恢复,才给汉人带来曙光。尽管面临这样的困境,但《集王圣教序碑》的地位大约形成于元代。有人公开申明自己是模习《集王圣教序碑》,陶宗仪《书史会要》:朱振,“草学《圣教序》,真师赵魏公”。这在宋代是不可想象,虽然大家也在学习《集王圣教序碑》。最直接的证据是大书法家赵孟頫学习过《集王圣教序碑》。虞集在论述赵孟頫书法时历数其临习渊源称:行书诣《圣教序》而入其室。《集王圣教序碑》与《洛神赋》《十七帖》一样

成为窥视二王书体的门径。从元朝开始人们已经试图将《集王圣教序碑》纳入主流的书法价值观念中。《集王圣教序碑》被列入王书的经典法帖之中加以推荐,或许代表士大夫阶层有着不同于宋代士人的偏好和转向。以赵孟頫书体为馆阁体之基础,影响朝野。范式的改变,使得像宋人崇尚文人书法的风尚也随即烟消云散,颠倒过来的还有对《集王圣教序碑》所代表唐宋的官告体的态度,在流行的赵字馆阁体面前已经相当古朴典雅。

在明代有些人目中《集王圣教序碑》的书法已经成为“百代楷模”。书家以为要寻找右军笔非此碑不可。这时书家习字时,不但学习《集王圣教序碑》,其他的集王字碑也成为模习对象,并形成自己风格。

至此,《集王圣教序碑》已经获得与《兰亭序》完全相同的地位。项穆《书法雅言》断言要想临习此碑没有二十年的精进之功,不能得知其奥妙,适宜学者寥寥无几。人们视此碑不断本为瑰宝,收藏家学与不学的人都购一本以方便示人,尤以陕西士大夫为最甚。

在《遵生八笺》《长物志》等几部大众生活普及读物的推介下,《集王圣教序碑》成为一般文人生活常识的一部分,和服饰、家具、食物、茶、酒等种种器用一样作为生活的必需品出现。

随着《集王圣教序碑》价值的普及,宋代拓本精品当时存世者尚多,不惜重金亦不难购得。退而求其次,碑石尚存西安,可使拓工精拓,价值也在《淳化阁帖》之上。鉴定《集王圣教序碑》拓本遂成一门专门学问,董其昌称:纷、紕、何,以及内出的出字,少此五字者即是宋拓,和《稷拓》损五字、或七字本一样。为满足普通民众的一般需求,明代初年《集王圣教序碑》便被重刻在木板上,据看到拓本的王壮弘说,木刻拓本很少见,但纸墨精良,与《淳化阁

帖》的重刻拓极为相似。西安碑林现存的有崇祯十五年(1642)黄甲铸重摹刻的《集王圣教序碑》(图 8),这时的大明王朝已摇摇欲坠,喜好者一丝不苟的镌刻使人仿佛回到太平盛世。明代是一个翻刻《集王圣教序碑》的高峰。

《集王圣教序碑》的存在,使我们可以直接观察以往被人们忽略的地方。正是从这个视角出发,可以探讨的内容既有碑石的构造形式,又有碑石流传过程,也有文本产生的背景,以及怀仁集字模式所带来的影响,最后是关于《集王圣教序碑》所代表的王字系统的确立。我们选择并行式的研究并不是只要简单地强调问题繁杂性的一面,而是尝试对多学科背景下不同问题观察进行整合,藉以全面了解著名碑石产生后与社会之间的互动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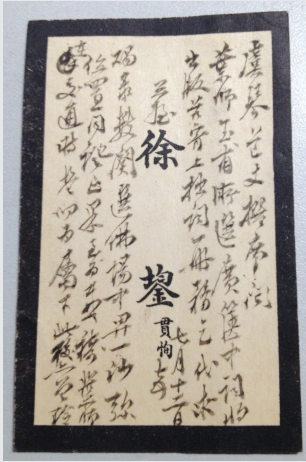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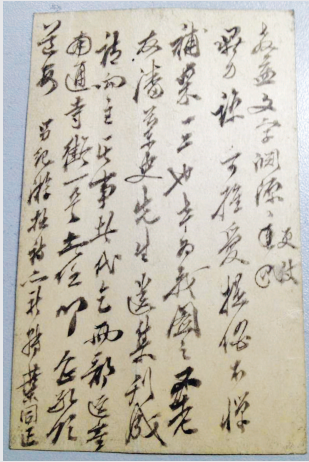
当然如果说就此《集王圣教序碑》已完全赢得书法史上的绝对稳固地位,话语空间轻松地获得转移,显然有某种程度的夸大。事实上,质疑声从未停止。怀疑者所批评的对象并非搜集王羲之字,而是采用釜底抽薪的办法直接怀疑怀仁是否采用王羲之书帖集字,还是怀仁自书?通常真实可靠是艺术品获得价值评断的基本标准,质疑从其真实性入手似乎是一个不错的选择。很可惜,质疑者忘记王羲之的书迹存在,从来就没有建立在完全真实基础上的承诺。

总之,《集王圣教序碑》树立后一千多年间的不同命运,促使我们正确地了解书体、书风在每个时代都有与之相适应的确切含义。但有一点可以肯定,不同于其他任何艺术门类,书法领域的王羲之,他的神圣在于永远只会被模仿,从未被超越。

(全文见《唐研究》第 23 卷,2017 年 12 月,本文为摘要,下同。作者为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)

小记徐贯恂致姚虞琴的一封信

赵鹏



友人见示一件徐贯恂致姚虞琴便信的图片,信写于自己名片的正反面,这种做法说明不是由信局邮寄,而是着人直接递至的,这也可知通信双方同在一地,按两人行迹,应该是在上海。徐氏为南通人,于我谊属乡前辈,故尤其引我注意。兹将全文录于下:

虞琴道丈撰席: 闻叶师玉甫所选《广篋中词》将出版,兹寄上拙词一册,务乞代求赐录数阙。选佛场中,畀一沙弥位置,同证正果,至为感禱。叶师在交通时,鑒叨为属下,此后亦曾聆教益,文字渊源,更仗鼎力,谅可推爱提倡,不憚补采一二也,幸为我图之。又,老友潘兰史先生遗集刊成,请向主其事者代乞两部,适寄南通寺街一号,无任叩企。敬颂道安。另,纪游拙诗亦祈转叶同正。愚侄徐鑒(贯恂)顿首,七月十二日。

本信的内容很清楚,总共说了两件事,一是听说叶玉甫(恭绰)编的《广篋中词》将出版,乃托姚氏转致自己的作品集,希望能够入选。自荐之事未能免俗,可徐氏的“选佛场中,畀一沙弥位置,同证正果”云云,却说得聪明得体。另一是闻知故交潘兰史(飞声)的遗集出版,请向主其事者索要两部。徐贯恂与潘与姚都曾是上海几家诗社的诗友,关系颇近。而他因文官甄用被荐任交通部路政司的次年,也即民国九年,叶恭绰正好出任交通部总长,所以他们有着上下属的关系。他在信中特别举此,自然有套近乎走后门的嫌疑,不过这还得自己能拿得出手才

行。周晋琦《卧庐词话》有云:“同学徐贯恂,号澹庐,年十二即以工书善诗名。所作词曰《碧春词》,曰《蝇须馆诗余》,清新可传。归安朱古薇侍郎称其词自壬子后一洗粉泽之态,与东坡、后村二家为近,可谓善变。云间杨古醞大令和《满江红》题其集,有‘如此清才供跌宕,伧堪游戏人间世。拔海涛北向望伊人,苍茫里’等语。其为词场耆宿奖许,有若此者。”由此可见他还是蛮有些干货的。

徐贯恂的词作,照周晋琦所举有《碧春词》和《蝇须馆诗余》两种,后一种又名作《丽镜簪词》。此外通行者还有一种《澹庐诗余》,那是前后两种词集的合刊本,写信送选的集子当系这一种。

本信的年份也可以考定,乃是民国二十三年,因为潘氏的《说剑堂集》就出版于此年,而《广篋中词》也正好于次年出版。《广篋中词》中收录了徐的《暗香》一阕,似乎更与此信有关。

有些奇怪的是此信所用的那张名片,其正面边缘加印有一个黑框,这种做法通常很难看到。经过一番考索,发现民国二十三年徐贯恂正遭逢母亲陆氏之丧,如果此信写于他的服丧期间,名片加上黑框就有了可能。然而问题是其母陆氏病故于农历九月初,而此信却写于七月十二日,无论中西历都在病故之前。要解释这个矛盾,似乎只能怀疑此信署款的“七月”乃是“十月”的手误了。

给名片加黑框,专在服丧期间使用,这可能算是名片的一种特例吧。



图 8 黄甲铸重摹刻的《集王圣教序碑》